

大学生文化修养

主 编 © 杨文英 洪娟 陈时芳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大学生文化修养

主 编 杨文英 洪 娟 陈时芳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共分为五个项目,内容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修养、礼仪修养、文学艺术修养、艺术修养、中西哲学修养。目的是为了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有利于大学生开阔视野,活跃思维,为其学好专业知识以及今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和深厚的人文底蕴,有利于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的人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生文化修养 / 杨文英, 洪娟, 陈时芳主编. —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605-8685-4

I. ①大… II. ①杨… ②洪… ③陈… III. ①大学生
—文化修养 IV. ①G64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52778号

书 名 大学生文化修养
主 编 杨文英 洪 娟 陈时芳
责任编辑 雷萧屹

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兴庆南路10号 邮政编码 710049)

网 址 <http://www.xjtupress.com>
电 话 (029) 82668357 82667874 (发行中心)
(029) 82668315 82669096 (总编办)

传 真 (029) 82668280
印 刷 北京荣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3.25 字数 320千字
版次印次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605-8685-4
定 价 6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10) 57131667

订购热线:(010) 56591657 QQ: 1803819931

投稿热线:(010) 56591670 QQ: 1395738560

读者信箱:lg-book@163.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大学生文化修养》一书的基本任务是：通过本书的学习，实现对读者进行人文精神的教化、培养功能，使读者通过本书的学习，对中国传统文化、文学、哲学、美学、艺术欣赏、礼仪修养等人文学科知识有基本的认识 and 了解，从而认识到人文精神对我们生活的重要意义，认识到人文学科对陶冶我们情操的重要作用，并促使读者进一步去阅读更多的人文学科类书籍，在人文精神的滋养中升华，形成良好的精神品质。

跨入21世纪以来，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全面推行素质教育，为国家和民族培养素质良好、智慧优秀、人格健全、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已成为教育界以及社会各界的共识。

素质，作为人必须具备的基本品质，作用于人的一生，并贯穿于人的思想、品质、行为的各个方面。大学时代，是人生的黄金时期。大学时代形成的素养对人的一生有深远的影响。我们进行的文化素质教育，重点是指人文素质教育。所谓“人文素质”，一般是指人们在人文方面所具有的综合品质或达到的发展程度。如果“科学素质”的重点是指导人们如何去做事，那么“人文素质”的重点则是指导人们如何去做人。人文素质的核心不是知识，而是精神。因此，人文教育在传授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同时，更注重培养读者的人文精神，使之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全面提高读者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

我们撷取人文学科领域具有代表性的精华编写而成。以期在提高读者文化素质、丰富读者人文素养的教育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深知，加强读者文化素质教育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可能立竿见影，但只要认识到位，找准方法，坚持不懈，提高读者文化素质和文化品位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尽管我们本着认真、严谨的态度，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力求精益求精，但由于水平有限，加上时间紧迫，难免出现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希望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以便将来修订完善。

编者

2018年5月

目 录

项目一 中国传统文化修养	1
任务一 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2
任务二 中国汉字	7
任务三 中国古代文学艺术	9
任务四 中国古代科技	19
任务五 中国古代哲学	25
任务六 中国传统节日	28
任务七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30
任务八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33
项目二 礼仪修养	37
任务一 大学生应培养的几种素质和能力	37
任务二 求职面试礼仪	44
任务三 校园礼仪	55
项目三 文学艺术修养	67
任务一 文学欣赏概述	67
任务二 诗歌欣赏	75
任务三 散文欣赏	94
任务四 戏剧文学欣赏	104
任务五 小说欣赏	117
项目四 艺术修养	131
任务一 美学·艺术·艺术欣赏	131
任务二 绘画艺术欣赏	141
任务三 影视艺术欣赏	149
任务四 音乐艺术欣赏	163
任务五 建筑艺术欣赏	172
项目五 中西哲学修养	181
任务一 中西哲学举要	181
任务二 智慧的痛苦 ——什么是哲学及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	195
附录 著名哲学人物简介与哲学名著推荐	202
参考文献	206

项目一 中国传统文化修养



项目概述

学习本部分内容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其目的不仅在于知识的掌握，更在于精神的浸润；要注意从文化的视野分析、解读当代社会的种种现象，从而培养对民族文化的感情和担当大任的历史责任感。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在近六千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 26 种文化形态，但在这些文化形态中，只有一种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确，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的祖先用劳动和智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它不仅照亮了历史，照亮了人类，也照亮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作为一个现代中国人，继承五千年文化传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事业，是我们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

本项目着眼于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成、发展与基本精神以及中国汉字、文学、艺术、哲学、科技、节日等知识，使学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并能够正确认识其中的精华与糟粕，力求拓展学生视野，开拓学生思维，陶冶学生情感，丰富学生人文知识。



项目要点

- 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 中国汉字
- 中国古代文学艺术
- 中国古代科技
- 中国古代哲学
- 中国传统节日
-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任务一 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一、文化的界定

广义上讲,文化是指人类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总和。它包括的领域甚广。如认识领域的语言、哲学、科学、教育等;艺术领域的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等;器用科学领域的生产工具、日用器皿以及相关的制造技术等;社会领域的制度、组织、风俗习惯等。这里既有物质文化,又有精神文化。就广义而言,文化是人类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物质与精神存在的总和。

狭义文化又称人文文化,是以社会集体(民族或阶层)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传承累积而自然凝聚共有的人文精神及其物质总体体系。它指的是人的全部精神创造活动,是意识、观念、心态和习俗的总和,即精神文化。它涵盖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道德伦理、政法制度、文物典章、宗教信仰、哲学美学和风俗习惯等。精神文化又可分为带社会意识形态性的文化和不带社会意识形态性的文化。前者如政法制度、道德伦理、宗教信仰、哲学美学和大部分文学艺术等;后者如语言文字、科学技术和相当部分的风俗习惯与部分文学艺术(像音乐、舞蹈、美术、雕塑、建筑、杂技、书法及文学中的山水诗、爱情诗中的很大部分)等。

“文化”一词源自拉丁文的 *Cultura*,原意是耕作和植物培育,以后逐渐由物质生产领域拓展到精神领域。中国历史学家朱寰指出其原义为耕种和栽培,引申有开拓、教化、培养、修炼之义。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曾提出“智慧文化即哲学”的著名论断,其内涵则包含了人的心灵、智慧、情操、教育等内容。进入18世纪以后,伏尔泰、康德等思想家、哲学家不断赋予文化以精神的或观念的意义。据《说文解字》记载:“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依类象形,故谓之文。”依此记载,仓颉在鸟兽爪迹蹄痕的启迪下,通过取类比象,“依类象形”,创造了文字。这些文字,是纵横交错的“纹”的组合,所以《说文解字》又说:“文,错画也,象交纹。”因此,“文”的本意是指各色各样交错的纹理,如手掌上纹理交错称掌纹,天上日月星辰交错称天文,布帛纹理交错称布纹。其引申义则包括“经纬天地”之义,《尚书·舜典》说:“经纬天地曰文。”比如周文王、汉文帝、隋文帝等,都取其经纬天地之义。只是后来,才渐渐衍化为“文字”“文章”“书籍”等的代名词,而其原来的意义反而淹没不彰了。“化”的本义为改易、生成、造化,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如《易·系辞下》中“万物化生”的“化”,引申则为改造、教化、培育等。所以《说文解字》说:“化:教行也。教行于上则化成于下。”“文化”二字合用包含有“人文”与“化成天下”“以文教化”的意思。我国古代最早将“文化”二字连在一起的是西汉著名学者刘向。他在《说苑·指武》中说:“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文选·补亡诗》和南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分别有“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和“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的记载。这里的文化都含有“文治教化”之意,它与天文(自然)是相对的。天文蕴涵的是古代中国人的自然和宇宙意识,人文体现的则是他们对人伦社会活动的思考。

二、中国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文化即中华民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所创造的文化。中华民族是由华夏族衍化而来的包括汉族在内的 56 个民族的总称。因此,中国文化不仅是指汉文化,也包括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

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中国文化包括传统文化、近代文化和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传统文化产生于农业时代,主要指封建社会的文化。现代文化产生于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创造与发展的新型文化。顾伟列先生在《中国文化通论》中指出,“传统与现代之间本无一条明显的分界线可寻,文化转型也绝不意味着文化断裂。”一般来说,中国传统文化一般是指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前我国的古代文化。以鸦片战争为转折,开始了我国文化的现代进程。它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和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重大历史文化事件,其显著标志是教育制度的变革、学术观念的变革、宗教思想的变革和近代自然科学的确立。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现存的典籍浩如烟海,尤其以“三玄”(《周易》《老子》《庄子》)、“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为其渊数;在学术流派上,虽百家争鸣,但儒、道两家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东晋至南北朝、隋唐,由印度传入的佛教文化逐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此,儒、佛、道三足鼎立,构成了唐宋以来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就明白地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基本结构特征。而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文化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流长”指可以从其流传的时代、文化的类型以及传播的地域来说明。如按时代划分,可以分为九个时代:原始文化、殷周文化、春秋战国文化、秦汉文化、魏晋南北朝文化、隋唐文化、两宋文化、辽夏金元文化、明清文化。按地域、民族划分,远古时代可分为三大文化集团,即华夏文化集团、东夷文化集团与苗蛮文化集团。

三、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背景

(一) 封闭的内陆环境

人类文化的发展史表明,地理环境是历史文化赖以发生发展的物质条件。世界上几个古代文明,如古希腊、罗马文化凭借其海洋地理优势,带动着欧洲文明同步发展,而埃及和巴比伦文明却被毁灭了,其间原因很多,有一点就是与其地理条件有关。在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周围,是大片的沙漠,人类能够生存的地方实在太稀少,因此,人群之间为争夺生存居住地的斗争过于残酷,在遭遇外族入侵时一蹶不振,最后导致其走上了毁灭的道路。而中国地处亚欧大陆东端,东临茫茫沧海,背靠高山大漠,西南山高水险,疆土极为广袤,内部平原广阔,这种一面临海,其他三面与域外陆路交通极不便利的地理环境,加上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不仅使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相对阻隔,造成了中国文化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而且造就了华夏中心主义的心理定式。这种地理环境和心理定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不无影响。

第一,这种半封闭的地理环境和相对良好的气候,为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起源、发达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人文哲学思想生成、发展创造了条件。在这种相对发达的农业文明社会

里,人们适应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存方式,也养成了中华民族相对温和的性格和安于现状、缺少竞争的心理。

第二,它促成了中华文化的自发性、独立性和一贯性。尽管异族入侵,但其文化却不曾中断。而且在文化的融合和吸收中铸造了中国人独特的世界观念和文化心理,形成了其特有的自成体系的哲学、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

第三,它助长了华夏中心主义的思想,把“天下”视为中国,把环绕华夏的邻邦视为夷狄蛮戎。“中国”一词的内涵就是中国人富于尊严感的“自我意识”的具体表现。

第四,这种偏居一方的地理位置,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保护反映机制”。历史上虽有外族入侵,但幅员辽阔回旋余地宽广的地理环境使中国纵使丧失了部分国土,仍有广大退路可供回旋,所以唯中国能对边族潜移默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文化风格和系统完整,并使之绵延不绝,使中国文化具有超常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中国的中原文化,则带动着地域更加辽阔的东亚文明同步发展。

(二) 农耕型的经济模式

人类文化的类别大致不外乎游牧、农耕、商业三种类型。游牧、商业型文化起于内部经济不足、需向外寻求,文化特性常为侵略性的。农耕型可自给自足,无须外求,文化特性常为和平性的。中国地处东亚大陆,地域辽阔,虽耕地面积较少,但泥沙冲积形成的肥沃平原,太平洋吹来的东南季风,给中原大地带来了充沛的雨水,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生态环境,孕育了华夏民族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生产模式。

自先秦以来,历代统治者都将农业生产作为立国之本,重农轻商成为各种社会、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潜意识。在这样的国家里,商人是不受重视的。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把民众按行业分为士、农、工、商四等。士通常是来自地主阶级,农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这两个行业受到社会的尊重,任何人出身于“耕读世家”,往往引以为荣。那些读书人虽然不亲自耕地,但他们一般出自于地主家庭,家庭的兴衰和农业生产的好坏直接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们的宇宙观和人生观都主要反映了农民的思想。再加上他们受过教育,使他们得以表达农民自己没法表达的思想,这种表达在中国就采取了哲学、文学和艺术的形式。历代王朝把重农作为治国之道,以农立国的国策、农耕工具的改造和耕作技术的提高,大大促进了农业文明的发展,为传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典型的农耕文化,而且是精耕细作的农耕文化。中国文化中的务实精神、中庸之道、尚农与重农思想、集权主义与民本主义共存、安天乐土的生活情趣等,都与这种农业经济背景相辅相成。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封闭的生态环境条件下,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的产物。

(三) 宗法制的伦理社会

宗法制度是中国古代维护贵族世袭的一种制度。所谓宗法,就是中国古代社会规定嫡、庶系统的法则。宗法关系是由氏族社会的父家长制蜕变而来的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宗法建立在宗族的基础之上,宗族由若干个同血缘的家族集合而成,由家庭而家族,再集成宗族,结城乡社,进而成为国家的基石。在宗法制度下,家族—宗族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统治和服从为内核的政治、经济和道德的共同体。它对国家与社会具有维系秩序的功能,同时,对国民性格的塑造也有深刻的影响。

在古希腊,希腊人在跨海迁徙中,伴随着移民浪潮,不同种族的人出于利益驱动,打破了原有的血缘纽带,出现了杂居和债务奴隶,传统上基于宗法血缘关系的氏族贵族统治日趋弱化,城邦式的国家随之产生。而中国却与之不同,几千年来沿袭的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传统农业模式,国民的主体——农民大多稳定地聚族而居,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方式,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强化了安土重迁及服从权威的国民心理。因此,宗族为了加强自己的团结,宗族血缘意识就作为一种天然的纽带被保留了下来。血缘组合而成的农村乡社,世代代保存了下来,土地转化为贵族专有,首领转化为地方官员,族人尊崇共同祖先以维系亲情。随之,嫡长子继承制、分封制、宗庙祭祀制确立并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模式。中国的社会制度可以称之为“家邦”。在中国这种社会制度下,人们是通过家族来理解国家的,“天下国家,本同一理”就是这种观念的体现。从先秦迄于明清,尽管社会形态有所变化,但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等级结构却长期沿袭未变。为维护这种组织形式,严格规定了辈分、嫡庶、长幼、主从等等级秩序。它们认同宗法等级的“合法性”,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伦理道德倾向,偏重道德的价值取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处于亘古不变的核心地位。

四、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融合

(一) 华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融合

中华民族是历史融合的产物。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也是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早在新石器晚期,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已经出现了许多部落和部落联盟,产生了互不相同又互相影响的文化。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黄帝战胜炎帝、击杀蚩尤,炎、黄联合战胜太昊、少昊,以及尧、舜、禹禅让,都是中原先民各部落在向外发展中互相冲突、融合的历史痕迹。考古发现已证明,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黄河下游的新石器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已经对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后继者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产生重大影响,发生相互渗透的联系。与河南龙山文化阶段大体相当的良渚文化(长江下游)与山东龙山文化关系更为密切。

夏、商两代,汉民族的发展已具雏形。据有的史学家考证,夏的先民是从长江下游发展至黄河下游的,商的先民是由辽河下游发展至中原的,周的先民是由渭水流域向黄河下游发展的。夏、商、周三代已经形成统一的分封制的奴隶制国家。中华民族的先人,在一万年前已有百万之众。至夏初(公元前21世纪)已有1355万人口。在西周(公元前11~前8世纪)全盛时期人口约达2000万。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1~前221年)中华民族的融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经过500多年的战争兼并,原来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都与中原华夏族相互融合,形成“五方之民共构天下”的局面。原来的秦、楚、吴、越,都已华化。尽管战争连绵不断,由于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加上疆域的扩大,到西汉初年(汉平帝元始2年,即公元2年),人口数已达5959万。汉代继秦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实现了空前的统一。汉族在汉代已基本形成。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9年)是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不仅中原地区的居民融合程度更深,而且西北和北方的大量少数民族与中原进一步融合。五胡十六国时期,由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少数民族先后建立的13

个政权,使东北、内蒙、甘肃、宁夏、青海等地的居民与中原居民得以广泛深刻地交往、融合。至唐代(公元618~907年),中华民族的活动疆域和人口,都空前地扩大和增加起来。盛唐时期,人口总数约8000万。

宋、元、明、清(公元960~1911年)的近千年时间里,中华民族的发展更趋成熟。宋代(公元960~1279年)北方先后建立的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使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得以进一步统一、融合。其中女真人建立金国(公元1115~1234年)曾将势力推至淮河以北,先后在北京、开封建都。元朝(公元1271~1368年)是由蒙古族建立的朝代,清朝(公元1644~1911年)是由满族建立的朝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扩大和密切了他们和汉族的关系,还带动了其征服地区各族和汉族的融合。

元代的疆土极其广阔。在元朝统治下,不仅中原居民、北方居民得以进一步融合,而且西北、西南的民族和中原民族的关系也得以进一步密切。同时,在中国还涌入了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居民,以他们为主体,在吸纳土著居民的基础上,形成了人口众多的回族。清代已形成今天中国的版图(因清末被列强侵占许多领土,当时的疆域比现在更大)。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由几十个民族共同形成的中华民族已发展成熟。清代乾隆31年(公元1766年)的人口已达到20809万,至道光13年(公元1833年)增长到近4亿人(39894万人)。

近代(公元1840年以来),在与帝国主义列强的斗争中,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更加觉醒,民族意识不断增强。“四万万同胞共赴国难、共御外侮”,成为一致的呼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更标志中华民族的完全成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56个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真正平等,各民族的融合也发展到崭新的阶段。这是一个既有鲜明个性又有深刻共性的民族共同体。这是一股积蓄了近万年而形成的伟大力量。

(二) 古代中西文化交流

中国的传统精神具有海纳百川、不断自我更新的品质。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善于学习和吸收西方先进的人类文明成果,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在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发展起来的。

汉武帝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派遣一百多人的使团在张骞的率领下向地居中亚的月氏出发,促使了开通西域这一伟大历史事件。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华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向中亚、欧洲,促进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中外文化交流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高潮。中国丝绸、冶铸和水利技术远播中亚、朝鲜、日本和欧洲地区。

唐、宋、元时期,中外文化交流进入又一个迅猛高涨的新时期。中国的造纸、纺织技术、诗歌、汉字、印刷术、指南针、火药传入朝鲜、日本、印度、阿拉伯、北非和欧洲。传入中国的有:印度熬糖法、天文、医学、音乐、舞蹈、佛教及祆教、摩尼教、占城稻等。

明末清初,伴随着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相对自由活动,欧洲的科技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外文化交流出现了第三次高潮。明清之际的科技著作《本草纲目》《天工开物》被译成许多种文字流传国外。明朝时中国先进的技术、文化传入南洋。明朝后期原产美洲的甘薯、玉米、马铃薯、烟草传入中国,明朝还引进欧洲的水利方法。明朝中后期外国传教士来华,利玛窦等带来西方的科技著作。

任务二 中国汉字

一、汉字的产生与发展

相传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他长着四只神奇的眼睛，由他创造了文字。仓颉造字的事惊动了天地鬼神，于是天雨粟，鬼夜哭，亦有感焉。文字真的是仓颉造的吗？其实文字作为记录语言、传递信息、交流情感的符号，它的产生不是个人的要求而是人类共同的愿望，它是劳动人民在实践中集体智慧的结晶。文字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绝不是出于某个圣人的灵感。

首先，社会需要促进了汉字的产生和发展。原始社会时，先民过群居生活，彼此之间需要相互沟通、交流，进而产生了语言。但在实际交往中，语言却不能完全满足人们交流的需要。这是因为其无法克服“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空间限制”是指言语交际的双方进行交流时，彼此之间的空间距离不能超过语音有效传播的最大范围。就是说，相互沟通的两人，彼此之间的距离太远，都听不到对方所说的话，两人就不能真正的交流。就使相隔较远的两人在同一时间内是不能沟通的。如在原始氏族社会中，氏族族长发布命令，没有在场的人是不能听到族长所说的话的。虽然可以依靠人的相互传达，但却可能以讹传讹。“时间限制”是指言语交流过程中有些发生的事件或有些对事物的认知，是需要代代相传让后人了解的，而语音稍纵即逝，无法让后人知道当时的事情。就像氏族部落之间的争战，战绩如何、战利品是多少，后人要了解这些，单靠代代口头相传，很可能遗漏，甚至失真。由于“空间限制”“时间限制”阻碍了人们互相间的交流，为克服这一障碍，就需要有交流的双方都认可的文字符号进行协助。最早的汉字——象形（图画）文字就产生了。

其次，汉字的产生和发展与社会生产力相适应。正如上文所说，汉字是为了满足人们互相交流的需要而产生的，以记录、表达一定的事物。最初的汉字是人们生活中常见的、简单的、容易描绘的事物，如日、月、山、川、水、火、土、木等，这些都是大自然本身就有的。而后人凭借着主观能动性，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产生了许多新的事物，表达这些新事物的文字也随之产生了。如砍伐的“斧”，装东西的“皿”“盆”“孟”，捕猎用的“网”等。

二、汉字的性质及六书理论

世界各国的文字不尽相同，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表音文字，如英文、德文、西班牙文等，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使用的文字也属这类文字。表音文字并不是说只有音而没有意义，只是字母和它所代表的词只有语音上的联系而无意义上的联系。如 horse（马）、work（工作）等单词有音也有义，但音、义之间并无联系。我们称这类文字为表音文字。第二类是表意文字，如我们的汉字。由于这类文字其中包含着表音的成分，是兼用意符和音符的文字，所以，简单地称为表意文字。第三类是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混用，如日本文字就属假名和汉字混用的文字。假名源于我国汉字的某些偏旁或某些字的草写，脱略其意，成为单纯的表音符号。日本文字则是在我国汉字的基础上创立的文字体系。

一套文字体系从前所未有到发展成熟需要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最初的造字过程是观物取象的过程。汉字由图画文字发展而来,汉字的发展史又是图画文字的象形、象意特征逐渐退化的历史。这种退化不是要将汉字发展成一堆纯粹假定性的符号,而是要使汉字的表意功能更好地适应语言和思维的发展。汉字数千年的发展过程,是其与生俱来的象形表意功能不断完善的过程。

《汉书·艺文志》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还给六书分别下了定义,并举了例字: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诂诂,“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六书说是最早的关于汉字构造的系统理论,对研究汉字贡献很大。但如果认为六书是造字之本,那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历史误解。因为汉字在刚刚萌芽的时候,并不一定马上就有相应的理论产生,人们在汉字的实际应用中,不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才概括出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而提出于战国末年,从东汉才真正开始的分析汉字形体的六书,正是汉代学者根据汉字的字形、结构推想先民造字时的情形而总结出的理论,故正确地说,汉字才是六书之本。此外,由于时代的局限,六书理论并没有从汉字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角度阐述其规律性,因此,我们今天读关于六书理论的古籍时,应去其糟粕,吸其精华,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完善和创新。

三、汉字与中国传统伦理观念

汉字是中华民族创造的人类最宝贵、最有价值的文化之一。汉族的祖先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了汉字,也从此书写了中华民族辉煌的文化历史。汉字伴着中华民族走过了几千年,始终散发着东方人永恒的“神气”。汉字所体现出的思想、文化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它早已成为华夏民族智慧的表征,汉字的形象已成为民族的内在精神和外在脸谱。汉字是中华民族生命的泉水,汉民族灿烂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受惠于汉字,在许多传统文化领域里都得到明证。作为思想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伦理道德思想,同样以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汉字对于儒家伦理观念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启迪。儒家的先哲们通过对汉字具像的透视,发掘出了华夏伦理的精髓,奠定了儒家伦理观“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的基石。“三纲”简单说,就是大臣要按照君王的意志办事,子女要按照父亲的意志办事,妻子要按照丈夫的意志办事。“五常”就是每个人要做到仁、义、礼、智、信。人们在造字和讲解字义时,也常常把这种伦理观念加进去。

(一) 君、臣、民

“君”的古字上面是两只相对的手,双臂内侧是个“口”,像个正面坐着处理政务的君王。“臣”的古字像个面向左边趴在地上行匍匐礼的大臣。“民”的古字像个面向左的男人和女人的结合体。到了汉朝,君王的正面坐形改成了面向左的侧面形,就是现在的“君”字。臣和民应该面向君王,表示服从和恭敬,故面向左改为面向右,成了现在的“臣”和“民”。

（二）无子不孝

“孝”字的上边是个“老”字头，下边是“子”，是小孩搀扶着老人的形象。孝就是尽心奉养父母、照顾父母的意思。汉朝以后的统治者大都提倡孝道，对不孝的子女要定罪判刑。不孝的罪行中，最严重的是没有后代，没有子女的人被看成大不孝。维护这种观念的人就把“孝”字中的子解释成男孩子，说没有男孩子的人就是不孝。另外，“好”字左边是“女”，右边是“子”，意思也是多生孩子就好。这种生育观念到了现在还有影响。

（三）带“女”字的贬义字

在强调男子重要的同时，贬低妇女的作用。“女”的古字像双手交叉在胸前（也有的像双手被绑在身后）跪在地上的女人。这说明商朝时妇女就处于被统治的地位了。社会不但歧视妇女，还把许多坏人坏事和妇女联系在一起。人们在造一个字时，如果是贬义，就把“女”字加进去。比如奴隶的“奴”、奴颜婢膝的“婢”、贪婪的“婪”、佞臣的“佞”、奸人的“奸”、妨碍的“妨”以及“娼妓”“嫉妒”“妖媚”等。女子应该待在家里，这样才平安，所以“安”上为宀（房子的符号），下为女。如果走出家门就会引起麻烦。“妥”字上为“手（爪）”，下为“女”，意思是管束住女子才能安妥。诸如此类造字在心理上的偏见无不反映了男尊女卑，经儒家文化强化以后长期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规范，反映了男子处于权力中心、妇女地位低下的男尊女卑的价值观念。压迫歧视妇女，反对妇女走出家门、走向社会的观念到了20世纪才开始清除。

汉字在造字和讲解字义时，有一些封建思想糟粕，我们要注意鉴别。但汉字是汉民族思维和交际最重要的书面符号系统，是中国文化的脊梁，具有独特的魅力和生命力。

任务三 中国古代文学艺术

一、中国古代文学

（一）中国古代文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及现代意义

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化中最有活力、最辉煌灿烂的一部分。在历史发展的长河里，中国文学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理想信念和美学追求。表现出了自己独特的个性和精神风采。从瑰丽奇特的远古神话到《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此起彼伏，高潮迭起，连绵数千年，不断创造出反映人民生活 and 时代精神的文学奇观，出现了许多古今知名的文学家和文学巨著。

文学作品在古代典籍中比重最大，发展历程最为漫长。中国文学在文字诞生之前就已经产生了，即使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中国文学也走过了3000多年的历程。中国文学是传统文化中最容易为现代人理解、接受的一种形态，是沟通现代人与传统文化的最直接的桥梁，也是世界其他文化背景中的人民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佳窗口。

（二）中国古代文学的辉煌成就

1. 《诗经》与《楚辞》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305篇。

“楚辞”本是战国初期兴起于楚国的一种诗歌样式。经过刘向、王逸等学者的收集、整理，编成《楚辞》。《诗经》和《楚辞》合称“风骚”。

2. 先秦散文与汉赋

史官的记录成为史书，也就是所谓的历史散文。先秦的史书主要有编年体的《左传》、国别体的《国语》《战国策》、专记个人言行的《晏子春秋》。春秋末年开，始，“士”的阶层兴起、壮大，他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政治主张、展开论辩，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产生了以论说为主的诸子散文。

赋兼有散文和韵文的性质，主要特点是铺陈描写、不歌而颂。产生于战国后期，接受了纵横家游说之辞及楚辞的巨大影响，到汉代达到鼎盛阶段。之后有六朝的骈赋、唐代的律赋和宋以后的文赋。

3. 唐诗宋词

唐诗的发展过程分为四个时期：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盛唐是指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的50年。形成了以王维、孟浩然为首的山水田园诗派和以高适、岑参为首的边塞诗派。富于浪漫气息和理想色彩的精神面貌在诗歌中的体现就是盛唐气象。盛唐气象最杰出的代表就是李白和杜甫。中唐诗坛有两个流派。一个是以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李绅为代表继承了杜甫正视现实、抨击黑暗的精神，强化了诗歌的讽刺功能；另一个是以韩愈、孟郊、贾岛、卢仝、李贺为代表的继承了杜甫在艺术上刻意求新、勇于创新的精神。

宋词的特征是：题材走向上注重个人的生活而不是社会现实；表现功能上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风格倾向上偏重阴柔和婉而不是阳刚雄豪。宋词可分为婉约词派和豪放词派。

4. 元杂剧与明清小说

元杂剧是融合了歌唱、舞蹈、说白、杂技等多种艺术形式的综合艺术。主要有唱词、对白、动作三个部分，一般分为四折。“元曲四大家”是关汉卿、马致远、白朴、郑光祖。著名的《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是元杂剧的代表作家。

中国的小说经历了先唐笔记小说、唐代传奇小说和宋元话本小说后，到明清时代臻于极盛。涌现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著名的长篇小说。

二、中国传统书法

在世界书写史上，唯有中国传统书法能够超越实用的局限而成为一门独特的艺术。这首先是由于汉字的构成特点及其书写工具等因素决定的。汉字的起源是由点和线组合而成的象形文字。“点”是线的浓缩，“线”是点的延长，因而中国的书法艺术，又被称做线条的艺术。使用时间最长的汉字书写工具是毛笔。毛笔极富弹性，遣毫之时提、按、顿、挫、疾、徐、收、纵，产生出极尽变化的线条造型。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书法艺术与中国文化相表里，与中华民族精神成一体。中华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贵和尚中。这种强调整体和谐的思想，主张以广阔的胸襟、海纳百川的气概，兼容并包，使社会达到“中和”的理想境界。书法的理想境界也是和谐，即通过笔画间的映带之势、顾盼之姿，既注重个体的存在，又达到总体的平衡。书法艺术的中和之美体现了中国文化“和为贵”的价值观。

（一）中国传统书法的种类

中国传统书法大体可分为篆书（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章草、今草），行书五种。

1. 篆书（大篆、小篆）

大篆。2000年前的殷商时代，刻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即“甲骨文”。书法细劲挺直，笔画无顿挫轻重。商周时代铸刻在钟、鼎、货币、兵器等青铜器上的铭文称为“金文”或“钟鼎文”。书法渐趋整齐，风格圆转浑厚。春秋战国时代，刻在石簠、石鼓上的文字叫做“石鼓文”。笔画雄强而凝重，结体略呈方形。上述的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后人称之为大篆。

小篆。秦统一中国后的文字称为小篆，是在战国时秦国大篆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规范统一字型部首后的字体。小篆行笔圆转，线条匀净修长，笔画粗细划一，上密下疏，呈现出纯净简约的美感。秦相李斯是小篆的鼻祖，流传至今的小篆作品《琅琊台刻石》《泰山刻石》等相传即为李斯所书。汉代以后，篆书的实用功能逐渐丧失，但作为书法艺术，仍然有名家，如唐代李阳冰、元代赵孟頫、明代李东阳、清代邓石如等。后世印章上使用的字体大多选用篆书。

2. 隶书

相传秦狱吏程邈改造篆字，创造了隶书。隶书字形变圆为方，笔画改曲为直，更便于书写。隶书盛行于汉朝。汉隶在笔画上具有波、磔之美。所谓“波”，指笔画左行如曲波，后楷书中变为撇；所谓“磔”指右行笔画的笔锋开张，形如“雁尾”的捺笔。写长横时，起笔逆锋切入如“蚕头”，中间行笔有波势俯仰，收尾有磔尾。在结构上，由小篆的纵势长方，初变为正方，再变为横势扁方。汉隶具有雄阔严整而又舒展灵动的气度，代表作品有《居延汉简》《张迁碑》《乙瑛碑》等，著名书法家有蔡邕等。汉代以后，隶书逐渐为楷书、行书所代替。直到清代，隶书又有复兴，出现了金农、邓石如、伊秉绶、赵之谦等书法家。

3. 楷书

楷书也叫正楷、真书、正书，汉末从隶书逐渐演变而来，字形由扁改方，笔画逐渐变波、磔为撇、捺，且有了“侧”（点）“掠”（长撇）“啄”（短撇）“提”（直钩）等，横平竖直，形体方正，结构严整。楷书定型于魏晋时代。汉末钟繇对楷书的贡献最大。他大胆创新，以楷书的横、捺取代了隶书的“蚕头雁尾”，促进了楷书的定型。

东晋王羲之，善于博采众长，自成一家，人称“书圣”。楷、行、草诸体皆佳，他的楷书《乐毅论》《曹娥碑》等，继承了钟繇的笔法，又有所发展，笔画较之钟书更加圆润清秀，结构更加严谨。

王献之，王羲之第七子，书艺超群，与其父并称“二王”。他的楷书作品《洛神赋》，传至宋代只存13行，有玉版刻本，世称《玉版十三行》。其笔画精严挺健，字型潇洒遒宕，章法顾盼有姿。

楷书到南北朝有了较大发展。南朝重要的书法家僧智永是王羲之的七世孙，他的《真草千字文》为楷草书结合的典范。北朝以碑刻独步书苑，其中以北魏成就最高，《张猛龙碑》是其代表碑刻。其书体被称为“魏碑体”或“魏体”，是楷书的一种，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楷书至唐代出现了繁荣局面，名家辈出。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是初唐书派

名家，他们融二王之流美与魏碑之凝重于一体。其中欧阳询尤负盛名，其书法世称“欧体”，所书写的《九成宫醴泉铭》是唐代楷书精品。盛唐颜真卿的楷书结体方正茂密，笔画横轻竖重，笔力雄强圆厚，气势庄严雄浑，人称“颜体”。颜真卿书迹很多，著名碑帖有《多宝塔碑》《颜氏家庙碑》等。颜真卿后成就卓著的是柳公权，他避开了颜字肥壮的竖画，把横竖画写得大体均匀而瘦硬，又吸取了北碑中斩截分明的长处，把点画写得好像刀切一样爽利深挺，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柳体”。楷书碑帖有《玄秘塔碑》《神军策碑》等。后人对比颜柳风格，喻为“颜筋柳骨”。

宋代楷书不及唐代，值得一提是蔡襄和赵佶。赵佶即宋徽宗，独创“瘦金体”，横画收笔带钩，竖画收笔带点，撇如匕首，捺如切刀，竖钩细长。碑帖有《千字文》等。

元代楷书名家有赵孟頫。他遍学前辈，兼擅各体，尤以楷书与行书冠绝当时。他的楷书于法度严谨中见秀美，被称为“赵体”，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齐名。

明代重视帖学，书家大多擅长小楷，著名的有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等。

清代书家大多学赵、董，很少有独立的特色。清末何绍基学颜体，兼习汉碑，能自成风格。

4. 草书

草书是为书写便捷而产生的一种书体。草书始于汉初，其特点是：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赴速急就。草书发展可分为章草和今草两大阶段。“章草”保留了隶书的书写意味，虽笔画出现牵带钩连现象，但字与字之间仍相对独立。东汉书法家张芝，擅作章草，被称为“草圣”。汉末，章草进一步草化，脱去隶书笔画行迹，上下字之间笔势牵连相通，偏旁部首也作了简化和互借，称为“今草”。今草自魏晋后盛行不衰，到了唐代，写得更加放纵，笔势连绵环绕，字形奇变百出，称为“狂草”，亦名大草。

宋代黄庭坚的草书创造了张旭、怀素之后又一个高峰，其《诸上座帖》笔势飘动隽逸，有独特风格。明代祝允明狂草形成一种汪洋恣肆的视觉效果，反差很大的是其楷书写得相当严谨。作品有楷书《出师表》、草书《自书诗卷》等。今天，草书的审美价值远远超越了实用价值。

5. 行书

行书是楷书的快写，它不及楷书工整，也没有草书草率。最大特点是用连笔和省笔，却不用或少用草化符号，较多地保留正体字的可识性结构，从而达到快速书写又通俗易懂的目的，便于传达文字信息。

行书萌发于两汉，成型于魏晋，至东晋产生了以“二王”为代表的具有高度艺术典范性的行书风格。王羲之的行书《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其笔势“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王珣的传世之作《伯远帖》行笔峭劲遒丽，自然流畅，为珍贵的晋人墨迹。

南北朝至初唐书坛，笼罩在二王行书风格之中。唐朝中期颜真卿行书开一代新风，其行书刚劲挺拔，笔势奔放，其书迹《祭侄季明文稿》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宋代行书注重表现文人意趣，著名的行书大家有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苏轼行书流利自然，用笔圆润活泼，作品有《黄州寒食诗帖》《前赤壁赋》等。米芾人称“米颠”，其《研山铭》手卷，运笔刚劲强健，具奔腾之势，乃米书之精品。

元至明中叶，无论是赵孟頫还是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均在晋唐书风中占据一席之地。清代行书受赵、董影响较深，形成了“台阁体”，典型代表刘墉。“扬州八怪”之一